



# 刘国光文集

## 第六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目 录

- 1 加大改革步伐，推进治理整顿（1990年1月9日）
- 5 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问题（1990年1月）
- 10 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关系的若干思考（1990年2月2日）
- 17 加强学术交流 推动区域经济研究  
——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1990年2月28日）
- 23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当前的调整  
——在莫斯科中苏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上所作学术报告（1990年2月）
- 36 中国国有制经济改革的探索（1990年2月）
- 55 在治理整顿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考（1990年2月）
- 71 会见台湾教授访问团时的讲话（1990年5月7日）
- 79 略论以改革促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1990年5月）
- 86 “八五”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1990年6月2日）
- 90 “八五”及“九五”期间中国经济改革大思路  
——《改革时报》特约记者专访（1990年6月9日）
- 96 略论逐步加大改革分量（1990年6月）
- 104 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管理科学院召开的陈云论著研讨会上的发言

(1990年6月12日)

- 114 逐步加大改革分量使之成为“八五”中后期经济工作的中心(1990年6月)
- 120 正确认识和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1990年6月)
- 133 以改革促稳定 在稳定中发展  
——“八五”时期“稳中求进”的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思路  
(1990年6月)
- 166 治整·改革·发展  
——《中国统计信息报》记者专访(1990年7月23日)
- 170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我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  
——在杭州召开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1990年7月)
- 179 治理整顿与改革  
——《瞭望》周刊记者专访(1990年7月)
- 186 谈当前经济的几个热点问题(1990年7月)
- 195 对“八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1990年8月)
- 208 打破地区封锁必须依靠深化改革  
——《东方时报》记者专访(1990年10月1日)
- 213 认清形势 深化改革(1990年10月30日)
- 219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1990年10月)
- 242 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年会上的讲话(1990年11月15日)
- 254 解决市场疲软靠深化改革  
——《中国新闻社》记者专访(1990年11月28日)
- 257 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及改革趋势展望

- 《阵地》记者专访(1990年12月1日)
- 267** 中国开始改革的十年  
——意大利《团结报》驻北京记者专访(1990年12月6日)
- 270** 对当前形势的几点看法  
——在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讲话(1990年12月20日)
- 287** 再谈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1990年12月)
- 299** 加强生态经济学研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在生态与环境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1990年)
- 308** 展望90年代的中国经济(1991年1月9日)
- 313** 谈谈逐步加大改革的分量  
——《特区时报》驻京记者专访(1991年1月18日)
- 318** 90年代深化改革的理论思考  
——《文汇报》记者专访(1991年1月26日)
- 327** 再论加大改革的分量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记者专访(1991年1月)
- 337** 如何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专访(1991年1月31日)
- 339**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充满机遇  
——《改革时报》记者专访(1991年2月12日)
- 348** 集中力量调整产业结构  
——《光明日报》记者专访稿(1991年4月5日)
- 354** 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若干思考(1991年5月4日)
- 372** 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若干问题(1991年5月)

- 20 日)
- 382 走一条自己的对外开放之路  
——《呼伦贝尔日报》记者专访 (1991 年 8 月 2 日)
- 384 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新华社记者专访 (1991 年 8 月 11 日)
- 387 要大力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1991 年 8 月 23 日)
- 392 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索 (1991 年 9 月 5 日)
- 399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召开的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 (1991 年 9 月)
- 405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问题 (1991 年 10 月 15 日)
- 424 中国经济形势的几个问题问答 (1991 年 10 月)
- 430 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与对外开放 (1991 年 11 月 6 日)
- 437 贺《经济导报》创刊四十五周年 (1991 年 12 月 25 日)
- 438 “八五”头一年起步良好 1992 年结束治理推进配套改革  
——《统计信息报》记者专访 (1991 年 12 月 30 日)
- 443 “8·19”巨变的原因分析  
——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1991 年 12 月)
- 452 《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第一章 绪论 (1991 年)
- 501 1992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黄金时期  
——《改革时报》特约记者专访稿 (1992 年 1 月 7 日)
- 508 苏联剧变的经济原因 (1992 年 1 月)
- 513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 (1992 年 1 月)
- 522 就“市场取向”的改革问题答《西南物资商业报》记者问  
——《西南物资商业报》记者专访 (1992 年 2 月 11 日)
- 528 经济改革的形势及其难点、热点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杂志记者专访（1992年）

**537 我的经济观**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1992年）

---

---

## 加大改革步伐,推进治理整顿\*

(1990年1月9日)

肇始于1988年第四季度的治理整顿,截至1989年第四季度,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过度的货币投放初步得到控制,1989年10月末市场货币流通量只比上年同期增加10%;过猛的物价上涨受到抑制,1989年11月份,35个大中城市物价水平仅比上年同期上涨5.9%;过热的经济增长开始回落,1989年11月份工业生产改变了前两月负增长的局面,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0.9%……总的看来,宏观经济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肯定一年来治理整顿的初步成果,并不意味着治理整顿已经达到了既定的目标。目前,总量失衡的格局尚未彻底打破,结构扭曲的矛盾依然尖锐,紧缩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的难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盲目乐观和对治理整顿掉以轻心。第一,治理整顿的成效基本上是靠行政手段取得的,如冻结物价、实行专营、关闭部分市场、严格压缩银行信贷额度等,采取这些行政性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它能为稳定经济争得喘息时间,但绝非长久之计。第二,治理整顿的成效是以增加财政负担为代价的,“花钱买指数”、高价吸收储蓄、补贴保企业平安等都直

---

\* 原载《金融时报》。



接或间接地增加国家财政支出，而在国家财政收入难以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势必增加国家财政困难，不利于总量平衡。第三，采取行政措施虽然使当年的总需求有所收敛，但长期积累下来的供需缺口仍未弥合，6000亿元的社会购买力，800多亿元的内债以及400亿美元的外债，都时刻提醒我们对控制总需求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第四，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尽管我们依据产业政策在能源、原材料、资金、交通运输等方面对农业和基础产业进行了必要的“倾斜”，但是行政性的冻结物价或限价措施产生了新的价格扭曲，不利于结构调整，而且由于未触动存量结构，使结构扭曲的问题没有明显改善。

因此，我们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治理整顿，即继续控制总需求和调整结构，在这点上千万不能动摇和模糊。值得认真考虑的是，继续实施行政措施、增加财政补贴和依靠增量调节来控制需求、调整结构，恐怕难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亟待寻求新的途径推进治理整顿。

在我看来，将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是在目前加大深化改革的分量，加快改革步伐，不仅是推进治理整顿，尽快走出眼下困境的需要，而且是保持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

我历来主张改革应当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而经过一年来的治理整顿，经济过热现象已基本消除，通货膨胀暂时得到遏制，出现了局部买方市场的势头，这都为深化改革提供了现实契机，从而为一些过去由于环境紧张、通货膨胀严重而不能或暂缓出台的改革措施的重新出台提供了可能和机会。事实上，1989年适当提高粮棉合同收购价格，提高煤炭出厂价格，提高盐价，大幅度提高铁路、民航、水路客运价以及最近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等改革措施的顺利推出而未引起任何不良的连锁反应也充分说

明，随着治理整顿取得成效、市场趋于稳定、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降低、宏观经济环境改善的条件下，不失时机、积极稳妥地推出更多的深化改革的措施，是完全可行的。

首先是改革宏观调控机制，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有步骤地推进宏观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过渡和转化。在这点上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在间接调控手段还不完善或不具备的条件下，适当地采取一些行政手段是必要的，但是，在运用行政手段时，要时时切记不能给进一步的改革设置障碍，不能借治理整顿搞垄断、搞分割。否则，不但不能真正解决当前的困难，还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恶化，经济生活的更加紊乱。以此为前提，在金融体制的改革方面，一是要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建立正常的货币发行程序，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总闸门”；二是在实施信贷紧缩、控制信贷总规模的同时，着力调整和改善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启动利率杠杆，充分发挥利率的宏观调控作用。在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方面，有必要改变国家财力分散、宏观调控能力削弱的状况，适当提高中央财政集中的程度，要积极准备在条件成熟时，逐步由财政包干制向分税制过渡，加强宏观调控能力。

其次是改革企业体制，建立企业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新机制。在继续坚持、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制的同时，改变企业包盈不包亏、政企不分、“两权”模糊的状况，采取多种形式，逐步做到企业产权的明晰化和经营权的独立化。

再次是改革价格体制，通过“调”、“放”结合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价格严重扭曲，既不反映价值，又不反映供求关系的状况，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条件。

此外，计划体制、物资体制、外贸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也要

配合治理整顿，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化。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深化改革不可能没有困难和风险，也不可能万无一失，但只要我们注重社会保险、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通过周密、细致、谨慎的工作，将困难、风险、失误减少到最低限度，还是做得到的。

---

---

## 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 与深化改革的问题<sup>\*</sup>

(1990年1月)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治理整顿决定和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一年多来，取得了压缩经济过热和缓解通货膨胀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有些对采取紧缩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及前几年经济过热造成的滞后影响估计不足，把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简单归咎于紧缩，特别是归咎于银行收紧信贷、收紧银根。他们主张全面放松银根，放弃总需求的收缩政策，以解决当前企业、市场、财政的困难，这种倾向性的议论不少。下一步怎么办？我认为照这种主张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议论。

前车覆，后车鉴。1984年下半年经济发展过热，信贷失控，一年投放票子262亿元，比改革前30年投放票子的总额还多，不得不进行全面紧缩。1985年初工业生产速度下降，跌入谷底，结果引起一片惊慌，许多地方惊呼生产滑坡。尽管当时理论界和实际部门有不少好意见，要坚持紧缩（当然不要一刀切），但是，当时宏观决策的思想依然是使经济重新走上扩张的道路。这种经济扩张政策，使银根从1986年中期放松，一直迟缓到1987

---

\* 原载《现代中国经济》1990年第1期。

年秋季，带来新的物价上涨，又使中央、国务院采取紧急措施，1987年9月开计划会、体改会，再次实行强硬的财政、信贷双紧方针。到年底，紧缩开始收到成效。刚进入1988年春，在“工业生产不要滑坡”的思想指导下，紧缩方针又被放弃，再次形成信贷发放的高峰。直到8月份，几年积累下来的过大需求，推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终于又发生全国性的挤兑存款、抢购商品风潮，这是几年来第三次强硬紧缩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紧缩之所以半途而废，都是强调工业速度不能滑坡所致。实际没有滑坡，而是遇到暂时困难。当时决策思想担心的是经济降温，生产速度下降。这样的指导思想终于把我国经济引上大调整的艰苦时期。这次紧缩，又到了关键时刻，又面临如何抉择的问题，如果说前两次总量的紧缩半途而废，导致新一轮的宏观失控，我们的国民经济还能承受，那么这次如果半途而废，出现更激烈的通货膨胀的冲击，经济就更难以支撑、难以治理了。

今后，治理整顿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执行，坚持双紧方针不能动摇。但在坚持宏观总量紧缩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即忽视总量紧缩的前一阶段的阶段性特征，简单继续执行前一段宏观总量紧缩为主的政策，忽视了适时的调节和推进结构调整。当前正确决策应当是把治理整顿的中心由总量紧缩为主转到继续坚持控制总量，同时，把重点转到结构调整上来，为此应做好各项政策的配套和落实，下大力量在改善结构、提高效益上取得实效。

关于总量控制问题，要继续坚持紧缩方针。紧缩大体有四个方面：（1）在财政政策上，要继续严格控制支出；（2）金融政策上要严格控制贷款规模，严格控制票子的发行；（3）在投资政策上，要继续控制投资的总规模；（4）在消费政策上，要坚决控制集团消费和个人不合理的超前消费。各项紧缩政策的力

度，应以经济不发生大的滑坡为限。从治理整顿时期的客观实际条件看，我们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二步 2000 年发展到小康水平，在近期保持每年 GNP 增加 6%—7% 就够了。总量紧缩涉及我们要勒紧裤带的问题，没这一条治理整顿是过不去的。要全国真正过几年紧日子，首先上面要示范，还要切实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能只一部分人过紧日子，另一部分人花天酒地。

关于结构调整的问题，按照五中全会决定精神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有保有压。首先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确保结束农业生产徘徊的局面，保证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不低于 4%，使农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其次，继续压缩加工工业的发展，保证能源、重要原材料、出口产品和基本生活资料、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对于市场严重滞销、消耗高、效益差的加工工业进一步压缩。保证整个工业生产有 8% 的速度就行了。在治理整顿期间调整的重点是产品结构，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工农业结构调整、加工工业和基础设施调整，需要大量投资，调整的余地不大，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更长时期的任务

治理整顿期间还要强调改革，逐步加大深化改革的分量。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文件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两个任务的关系做了很精辟的阐述：第一，治理整顿并不意味着改革停滞不前，更不是不要改革。治理整顿不仅将为改革的深入和健康进行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且其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第二，在集中力量进行治理整顿期间，改革要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并且为它服务。第三，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都不是目的，它们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不能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割裂开来，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总之，一方面，治理整顿是为深化改革扫除障碍，创造一个更好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治理整顿本身没有深化改革的配合不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本身都不是

目的，都是为了经济更好地稳定发展。

深化改革对经济上走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正常轨道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改革中为了调动积极性，为了扩大自主权，对企业、地方下放权力、让税、让利，是必要的，但放权让利过多过头，使中央调控力量大大削弱。针对这种情况，治理整顿期间，要强调多一点集中，多一点计划；国民收入更多一点集中到财政收入里来；市场混乱的现象要加以控制；对过度分散的财力、物力，适当增加中央控制的比重；暂时多采取一些行政性的调控办法；等等，都是必要的，否则难以进行较迅速有效的紧缩和调整。因此，行政的办法是必要的，但是单靠行政性的办法又是不能持久的。要使治理整顿取得成效，即使在治理整顿期间也要尽可能采取或转到用经济办法上去。采取经济办法就要考虑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完善经济机制，使经济真正走上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

过去我国经济长期以来没有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正常轨道，这次又犯了这场大病。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政策失误，一条是机制缺陷。政策失误，主要在经济发展中指导思想头脑发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追求过高的速度。机制缺陷，主要指我国片面的放权让利，改革措施不配套，微观的经济膨胀机制得到强化，自我约束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没有相应建立健全起来。这是引发最近这次通货膨胀和秩序混乱的经济体制的根源。要使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不但要通过治理整顿来端正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防止发展战略、发展政策上的失误；更根本的是，克服经济机制本身的缺陷，在完善经济机制运转的功能上下工夫，使经济不仅在治理整顿期间稳定、协调发展，而且在治理整顿后长期走这条道路。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相互结合，相互促进，这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

中国经济要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内在的迫切要求。

治理整顿已取得的成效主要是浅层次的问题，而深层次的问题只有通过经济机制的转换和完善，也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它要求在进一步治理整顿的同时要逐渐加大深化改革的分量。在整个治理整顿期间，由于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还没有完全走上正常轨道，改革的步子不能过大。主要是要围绕治理整顿的要求来进行。但是也要看到随着治理整顿取得更多成效，经济和市场趋于稳定，宏观环境好转的情况下，较大的改革措施不是不可以相继出台。1989年在价格结构上，适当提高粮棉合同收购价格，提高了盐和盐制品的价格，特别是9月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铁路、民航、水路、客运票价，并且进行了人民币外汇汇率调整，并未带来多大的社会震荡，连锁反应也不大。说明总需求控制住了，票子控制住了，人民币的发行、总额控制住了，宏观环境变好，人们的预期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出台一些较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推出一些原来由于经济环境过紧，通货膨胀压力过大而不能进行的改革措施。例如，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两权分开的企业改革，以及为建立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所需要的财政、税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可相机出台。



# 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关系的 若干思考<sup>\*</sup>

(1990年2月2日)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两大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分析了两者的相互关系，指出治理整顿是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前者要有后者的配合，两者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 治理整顿为深化改革创造适宜的经济环境

自1988年秋中央决定实行治理整顿以来，国内外一些人士发生过疑虑。有人认为，治理整顿意味着改革的停止和后退；也有人怀疑，十年改革是否搞错了，所以才来一个大的调整。这些看法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我国经济经过十年改革，出现了勃勃生机，经济实力增长之快，人民所得实惠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要进行这场治理整顿，并不是因为改革搞错了，而是因为，在十年改革和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由于在改革和发展两个方面都急于求成，

---

\* 原载《人民日报》。